

海上电影
学人文从

Chinese-Language Cinema

华语电影 与泛亚实践

聂伟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项目编号：S30103

Supported by Shanghai Leading Academic

Discipline Project, Project Number: S30103

国家广电总局部级社科项目GD09082阶段成果

华语电影 与泛亚实践

聂伟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语电影与泛亚实践/聂伟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 2
(海上电影学人文丛)
ISBN 978-7-309-06981-5

I. 华… II. 聂… III. 电影评论-世界 IV. J90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1268号

华语电影与泛亚实践

聂伟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李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25
字数 302千
版次 2010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309-06981-5/J·138
定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上电影学人文丛

主编：陈犀禾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石 川	孙绍谊	曲春景	吴小丽	陈犀禾
金丹元	林少雄	金冠军	聂 伟	蓝 凡

总序

长期以来,在国际电影学界的印象中,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电影(包括中国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一直如同好莱坞与欧洲那些所谓“真正”电影的影子,处于边缘和被遮蔽的地位。除了本地区的专家学者会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外,国际上发达国家的学者对此并不会投以太多关注。

上述局面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了改观,随着国际政治和社会的发展,西方学界对第三世界电影的发展日益关注,研究成果产生了一个集束式的“爆炸”。其中,中国作为国际大国地位的不断提高,也引起了世界对中国电影和文化的广泛关注。按照一些国际学者的说法,它已经“在当前国际电影批评和研究中占据了中心舞台”。

今天,围绕华语电影的历史、美学、批评与跨文化研究,业已构成一个颇具国际学术重要性的学术场域。同时,华语电影跨越地域限制、注重文化语言共同性的研究视角,也呼应了大陆、香港和台湾在政治上走向统一和体制上保持多元化这一特定历史进程,通过对电影这一重要文化媒体的研究,透视和影响两岸三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心理的性质、状态及其相互关系,从而使“华语电影研究”不再是一种书斋里的“死学问”,而成为当代文化政治的“活实践”。可以说,华语电影研究的兴起直接介入了未来中华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这也是这一学科在未来得以持续发展的深刻社会历史动力。

上海大学电影学科创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十余年筚路蓝缕,该团队凭借地处上海这一中国电影的发祥地、当代中国电影制作重镇和中国唯一 A 类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所在地等区位优势,引进了一批有海外留学背景并注重本土基础的学术骨干,近年来迅速崛起,在华语电影历史与产业、跨文化研

究、导演群落研究和上海电影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奠定了在国内外均获广泛认可的学术地位。目前,上海大学电影学是上海地区唯一的电影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是全国5个电影学博士学位授予点中唯一在北京地区以外的博士点,是上海市教委第五期重点学科(2007年至今)和上海市第三期重点学科(2008年至今)建设单位。

《海上电影学人文丛》包括本学科数位中青年学者新近的理论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呈现出上海大学电影学科团队的学术方向、研究理路与观念创新。未来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整合学术资源,聚焦学科目标,以“华语电影的理论、历史和发展研究”为学科建设的重点,以“上海国际电影学术论坛”(Shanghai Forum for Film Studies)为平台,加大学术交流与合作发展,建成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华语电影学术研究基地。

是为总序。

陈犀禾

目 录

一、 都市电影与文化研究

- 003 城市之光：上海电影与电影上海
- 011 世界性、细节现实主义与“猫性”人格
——浅析《万家灯火》的几个节点
- 021 战争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城市感性叙述
——关于《霓虹灯下的哨兵》
- 030 文化隐喻、符号矩阵与电影诗
——《巴山夜雨》的三重阅读
- 041 泛亚视域中的家国模式与离散叙事
——谢晋电影《最后的贵族》的典范意义
- 051 想象的“本邦”与“看不见”的都市
——试论新世纪以来上海电影叙事的空间转向
- 062 如何“西部”，怎样“电影”
——钟惦棐“西部片”思想的当代阐释
- 072 影视“现实主义”美学的当下重审

二、 新生代电影论略

- 079 从“戏台”到“站台”：读取中国第五代、第六代电影叙事与美学差异的视点之一
- 089 SMHM：新生代影像传播的文化模式分析
- 099 文化“解禁”与新生代电影的多重面向
- 109 新生代电影与当代都市的文化表达
——娄烨论
- 121 当代都市电影与民间欲望漂流
——王小帅论
- 132 人心的盲井有多深
——关于《盲井》
- 134 是真精神自传世
——《可可西里》的影像风格与精神理想
- 138 儿童视域的成人世界
——《看上去很美》的创新价值

三、 电影产业市场展望

- 143 从华语、泛亚到欧美：中国电影海外市场拓展的“三级跳”
- 147 中国动漫产业现状忧思
- 152 从“国际的”到“亚洲的”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价值期待
- 159 “后新生代”助推新电影节
- 164 启动泛亚电影共同体
——第1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侧记

- 168 好莱坞盲点之外的全球影像扫描
——纽约电影节回顾与展望
- 176 当西方遇见东方：奥斯卡的途中转身

四、 泛亚视域与韩国影像

- 181 从“韩国之眼”到“亚洲之眼”：“韩流”文化考察
- 187 “大长今”现象的亚洲启示
- 190 韩国电影女性形象之四种“变脸”
- 194 一部韩国电影的多重文化含义
——关于《王的男人》
- 197 不断重临的产业起点：银幕配额削减前后韩国电影产业观察
- 204 全球化语境下的“后东方”影像
——关于《春来冬去》
- 214 类型混杂、文化转喻与泛亚主体性建构
——亚洲视域中的当代韩国宗教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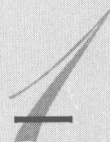
五、 影像文本点读

- 227 “大众”电影的上乘之作
——关于《天下无贼》
- 229 一场殚精竭虑的追踪游戏
——关于《跟踪》
- 231 “大片”神话何以为继
——“黄金甲”现象引发的思考
- 235 寻找类型创新的黄金分割点
——评电影《天堂口》

- 237 那一“点”是李安的玉玲珑
——《色·戒》观记
- 239 诚意欠奉的视觉侵扰
——关于《非诚勿扰》
- 242 与麦 Uncle 一起飙
——关于纪录片《超码的我》
- 244 都市现代性的温情救赎
——关于《蝴蝶》
- 250 再见美国派,再见毕业生
——关于意大利电影《等待黎明》

六、影剧批评现场

- 255 海派电视与文化现代性
- 259 老舞台与新故事
——评电视剧《舞台姐妹》
- 261 都市影像与“海”味创新
——关于电视剧《长恨歌》
- 264 揭开蒙娜丽莎的面纱
——关于美剧《绝望主妇》
- 268 实时悬疑剧的“克隆”之灾
- 271 寻找洁净的深呼吸
- 273 “雷雷”故事另类感人
——关于《我的兄弟叫顺溜》
- 275 四根骨头几条狗?
——关于《一根骨头四条狗》
- 277 将电视真人秀推向文化创意秀
- 283 代跋 “中间”分子的“途中漫步”



都市电影与文化研究

城市之光：上海电影与电影上海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迅速成为工业化的近代大都市、全国乃至远东的经济文化中心。1896年，这座号称“东方巴黎”、“东方不夜城”的神奇之都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电影放映活动，从此开始了穿行于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站在中国电影诞生一百周年的交界点上，就会发现没有哪座城市的历史与电影的渊源能够像上海这样深厚，这样密不可分。

从无声片时代开始，上海已成为中国民族电影的摇篮与半壁江山。直到今天，上海电影院线每年的票房收入在全国总体市场份额中所占的比例依然极为可观。百年中国电影谱写了百年上海的历史风情，它关涉着上海的去、现在和未来，也关涉着对这座城市的认识、理解与感念。上海这座传奇都市赋予电影以无穷的魅力和情感，而电影这场绵延不断的白日梦又让围绕上海的传奇变得感性十足。电影代表了注视上海的不同目光，它们相互交织又相互缠绕，共同分享这个城市的感性与秘密，如同胶片上无数张生动的面孔，在影院幽暗密闭的空间里散发出迷人的微光。

天堂之城

1908年，意大利人劳罗在上海拍摄了《上海第一辆电车行驶》和《上海租界各处风光》等新闻与风景短片。第一次出现在影像中的上海是陌生而新鲜的，充满了速度和力量的交响，以及西方人对这处东方“飞地”的猎奇心理。

这是一个传奇竞相登场的大舞台，是现代中国的引擎，它不仅是中国现代经济的中心，而且也是充满活力和刺激的新的文化源头，它把中国其他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了“乡土中国”。周璇在《夜上海》里唱到：“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电影让上海显得更像一个鲜活的尤物，如同刘呐鸥《都市风景线》

封面上那三道霹雳般的灿光所预示的,那个充满“light、heat、power”的天堂世界豁然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观众通过炫目的影像看到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魔宫一般高耸的巨型百货公司,看到了摩天大楼、宽大的马路、小汽车、霓虹灯、电影院、跑马场、跳舞厅、无线电、爵士乐、咖啡,红房子里摇曳的酒影与热气腾腾的罗宋汤。电影最初带给观众的是前所未有的震惊体验。习惯于静态阅读的观众突然在快速移动的影像中发现了另一个自己,他们对于文学的膜拜被电影迅速取代。电影的镜头无疑具有放大和渲染的功能,让这一切在现实生活中只为少数人所享用的奢华,通过神奇的影像让所有的观众都分享到了“天下大同”。

当然,最重要的内容还是文明人梦寐以求的爱情,特别是发生在电影院里的爱情。从《难夫难妻》、《新茶花》、《庄子试妻》、《海誓》和《劳工之爱情》到《再世姻缘》、《十字街头》、《恋爱与义务》、《少奶奶的扇子》等,许许多多挣扎在“新”与“旧”之间的观众通过银幕上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表达他们对于现代情感生活的向往。以大众情感酵素为培养基,爱情是电影中不约而同地表现 1930 年代都市上海的一大主题,也是这个时期上海都市生活的时尚花边。《十字街头》中赵丹与白杨共沐爱河的场景对当时的年轻人充满了刺激,虽然早在 1922 年已经就有《劳工之爱情》的求爱噱头,但《十字街头》中主人公的接吻戏依旧让电影院里的观众大开眼界。从此,“看电影”成了都市人恋爱最浪漫、最时尚的标志,在这里他们获得了人间天堂般的幸福感。与此同时电影行业也欣欣向荣,1927 年美国商务部的报告中显示,当时的上海有 26 家影院,而到了 1930 年代末,电影院的数量已达 36 家。影院里的观众大致分为五种:谈恋爱的青年,厌倦舞台剧的有闲妇女,无聊的富商,逃避生活的贫穷青年,还有借此谋生的影评人。这一时期上海电影留给中国电影史的不光是一批珍贵的视觉财富,同样也包含了新的生活观念和现实人生的乐趣。

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在 1930 年代的上海发挥了都市时尚生活指南的作用,无数涌进电影院的观众在那里接受了“美”和“文明”的现代启蒙,影片中英俊的男性和美丽的女性成为上海青年疯狂追慕的明星。所谓“有麝自然香”,从《少奶奶的扇子》中袁美云的惊艳一瞥开始,到胡蝶的《姊妹花》、阮玲玉的《三个摩登女性》、周璇的《马路天使》,再向后延伸到梅艳芳的《胭脂扣》和张曼玉的《花样年华》,几代女星的身影渐次勾勒出老上海风花雪月无限怅惘的感念。上海,电影的世界,人间的天堂。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晚近的《美丽新世界》中,它依然是农村青年张宝根心目中挥之不去的甜蜜憧憬。

原罪之城

然而，电影中的上海很快便褪去了天使的光环，光影转换之间上海开始露出爪牙狰狞的另一面。一个由白日梦编织的城市幻象与惨烈现实生活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假使有人问我生平最怕的是什么，我可以清脆地回答，‘上海’”。

“现代电影之父”奥逊·威尔斯的《上海来的女人》中，“上海”这一发音暗合了英文中小写的“shanghai”，意思是拆白党的欺骗和罪恶。《都市风光》中一家四口从乡下到上海讨生活，在途中小站等车的间隙观看西洋景，却不幸预知了他们在花花世界中不断沉沦和堕落的过程，最后被火车进站的笛声惊醒。然而，他们已经被那个充满欺诈的新世界、新生活给吓呆了，在车来车往之间不知何去何从。他们的彷徨在《城市之夜》中继续上演，通过贫民窟的人们离开都市回到农村的抉择而获得了进一步的印证。而《新旧上海》同样也将都市繁华谢幕前夕的灰色生活暴露得淋漓尽致。更为尖锐的是，在电影《马路天使》的开头，镜头从摩天接日的华懋大饭店屋顶一路往下摇，直到阴暗的上海地下层。上层社会的风光与奢华，底层生活的灰暗与贫困，两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纵然是一个天堂，也是造在地狱之畔的天堂。

影片《盲孤女》、《神女》和《新女性》等揭开了声色犬马的“黄金时代”背后另一个上海的真实面目：类似于八仙桥、四马路、苏州河一带的茶馆、澡堂和妓院等底层世界开始进入观众的视野，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歌女、吹鼓手、报贩、剃头匠和小报摊主等普罗大众成为电影中的主角。

“普罗”一词缘自古罗马，原意为“贱民”。为“贱民”立像，替弱者代言，用最具现代性的艺术形式来反映最基层的社会问题，是普罗观念对中国电影史的另一重改写。尽管有田汉拍摄《到民间去》的悲剧性失败，然而随着《狂流》、《春蚕》、《铁板红泪录》、《渔光曲》，尤其是《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和《都会的早晨》等的成功，暴露出破产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凋敝的生活与尖锐的反抗。而从另一个更为民间化的视角，电影《十字街头》通过几名大学毕业生的不同遭遇，描写青年知识分子所面临的生活与精神双重困境。《幸福狂想曲》讲述抗战胜利后上海社会黑吃黑的流氓本相，因此导致像《还乡日记》中的小夫妻那样，许多怀着重建新生活热望的青年在战后的上海几无立锥之地。这类电影不仅表现出底层市民和知识分子贫困失业的痛苦和悲惨命运，也使得这一时期的影像上海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展示。相比《十字街头》、《生之哀歌》和《还乡日记》

中对青年知识分子时代精神困境的呈现,《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和《乌鸦与麻雀》等从更加民间化的视角揭露黑暗,针砭社会现实,因此成为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

在上海底层生活为主题的影片中,《上海二十四小时》借助对比蒙太奇手法反映城市工人和资本家两大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女工们疲惫地下班的时候,资本家太太刚睡眼惺忪地醒来;太太泼在地上的鸡汁与童工受伤留在地上的鲜血形成强烈的视觉对比;工人一家为没钱请医生而一筹莫展,买办太太却付给宠物兽医高薪;工人的穷苦贫困与上流社会舞厅里的骄奢淫逸作对比,轰鸣喧嚣的车间和幽静的公馆相映照。影片的情节冲突揭露出了现实生活中愈渐激化的社会矛盾之一角,在这些左翼影片中,上海被定义为罪恶的渊薮,地狱中的放纵。

上海就像一朵偶然飘落而至的“罪恶之花”,充满了荒诞感和强烈的神经错乱症倾向,同时也充满了末日将临的危机感。现代城市与生俱来的罪恶不仅具有毒化一切的魔力,而且也预先为自己设定了不归之途。作为一次意味深长的历史补证,1980年代初桑弧导演的《子夜》让吴老太爷在闪烁的霓虹灯、汽车飞驰的速度和女人雪白大腿的奇观包围中再次遭遇电影式的休克——前一次则是发生在近半个世纪之前的文学式死亡。而此后不久,吴荪甫“死的舞蹈”象征了这种罪恶也在新的时代到来之前迅速地崩坏,在狂欢中消亡。

革 命 之 城

新中国创作的第一部故事片《桥》首先以革命的英雄主义开场,此后的《中华儿女》、《钢铁战士》、《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上甘岭》、《青春之歌》和《红旗谱》、《英雄儿女》都以革命和崇高作为至高的美学追求。然而从美化到神化,“高大全”模式在宣扬政治现代性的同时,却堕入了艺术保守主义的窠臼。

按照二元对立的观点,革命的对立面必定是反革命,城市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中屡屡成为一个不断被改造、清洗然后再歌颂的对象。1950年公映的《人民的巨掌》,单从片名就足以领略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革命与反革命,两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清算城市资产阶级生活的唯一议题。要么革命,要么反革命,往昔的风光都成了罪恶的证据,在二元敌对的逻辑中必须做出非此即彼的抉择。这不仅发生在电影故事中,生活中也要做出同样的抉择。

1957年的《不夜城》“从新的角度,从被改造的阶级,反映了社会主义的力

量和胜利”，一位曾经以“工业救国”和“振兴实业”为己任的民营资本家在“五反”运动中被查出有非法牟利的行为，他在人民政府和工人们的督促帮助下提高了思想觉悟，最后全家重新团聚在公私合营的热潮之中。《伟大的起点》是第一部正面反映工厂生活的上海电影，工人的技术创新为这座在社会改造中不断失血的城市填充了新的生命力。而《万紫千红总是春》则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吉祥里的一群妇女在“大跃进”形势的鼓舞下，在里弄相继成立了托儿所、食堂和缝纫组，她们走出家门，加入了职业工人大军。由此，这个城市的主人公，从南京路上的先生、太太和弄堂深处的小姐，摇身一变成为大步流星、身穿蓝色制服的工人，他们让那个曾经以十里洋场为标志的老上海开始与“下只脚”、棚户区以及周边广袤的农村接壤，也因此为新上海的形象增添了更加质朴与革命性的内容。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南下的干部是这座城市的新“东家”，他们对城市实施清算和改造，这本身也是一个逐渐适应和学习城市生活的过程。慢慢地，西洋式大橱、席梦思沙发、核桃木的西餐桌、樟木箱子和西餐厅等所谓资产阶级的物质文明逐渐复活在他们的居家生活之中，然而他们在老上海挑剔的目光中仍旧是外地人。南下干部进入都市生活的紧张感明确地表现为新主人与旧市民之间的微妙对立。电影《我们夫妇之间》之所以在当时屡遭批判，就是因为认识到了这种所谓的“改造”是双向的，而当电影试图表现出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时，不料却触碰到了彼时意识观念的雷区。

事实上，即便最经典的革命英雄主义电影的铜墙铁壁，偶尔也经不住这座城市天然的风情流露。《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战斗英雄陈喜进城之后迅速忘记了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不自觉地向“腐朽”的城市生活靠拢。影片中最能够说明他“腐化变质”的一个重要证据就是他对“革命的”破袜子御寒保暖等使用功能的否定，欣然地换上了样式新颖的尼龙丝袜。当然，他也只是短暂的迷失。陈喜打开春妮留下的书信，后者催人泪下的画外音与指导员的教诲如同醍醐灌顶，迅速分解了“糖衣炮弹”的毒素，从而完成了“拒腐蚀，永不沾”的灵魂改造。

同样是触及个人命运的改造题材，“文革”中《张家少奶奶》的瑞丽从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少奶奶一下子跌到社会的底层，此前她们从来都不放在眼里的里弄居民在这时伸出了友爱的手，教她学会自食其力，渡过难关。类似的故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弄堂里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说明革命不是唯一的主题，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的狂轰滥炸之下，仍然实实在在地跳动着一颗柔软、朴素的上海心，生活之心。人们在革命的变奏曲中失去了方向感，自然而然地将目光重新转向家庭生活。于是在工人阶级队伍的旁边，出现了市民兄弟